

戊戌军机四章京合谱。戊戌军机四章京合谱

戊戌军机四章京合谱。戊戌军机四章京合谱。戊戌军机四章京合谱

戊戌军机四章京

合谱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王夏刚 著

戊戌軍機四章京
合譜

戊戌军机四章京

合谱

王夏刚 著

戊戌軍機四章京
合譜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戊戌军机四章京合谱 / 王夏刚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6

ISBN 978 - 7 - 5004 - 8018 - 1

I. 戊… II. 王… III. ①杨锐 (1857—1898) - 人物研究
②刘光第 (1859—1898) - 人物研究 ③林旭 (1875—1898) -
人物研究 ④谭嗣同 (1865—1898) 人物研究 IV. K827 = 52
B254.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24948 号

责任编辑 孔继萍
责任校对 周 昊
封面设计 弓禾碧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2.5

插 页 2

字 数 400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前言	(1)
缘起	(1)
一、军机四章京的简要经历	(3)
二、研究史的回顾	(10)
(一) 有关军机四章京的研究论著介绍	(10)
(二) 军机四章京任职期间相关问题检讨	(13)
(三) 对史料可信性的研究	(23)
三、(四章京) 六君子之死与晚清政治	(26)
四、合谱撰写的意义	(36)
五、《戊戌军机四章京合谱》所用材料综述	(36)
六、本谱的编纂体例	(42)
戊戌军机四章京合谱谱前	(44)
戊戌军机四章京合谱 (一)	(82)
戊戌军机四章京合谱 (二)	(150)
戊戌军机四章京合谱 (三)	(191)
一、军机四章京的职责	(193)
二、军机四章京对新政的不同认知及人际关系	(196)
三、任命军机四章京所引发的反响	(200)
军机四章京合谱谱后	(256)
一、悼念和评价四章京杨刘林谭的诗文	(256)
二、评价或悼念四章京及六君子群体的文字	(278)
附录一 “百日维新” 期间光绪帝召见被推荐人员及任用情况	
一览表	(293)
附录二 “百日维新” 期间光绪帝召见人员一览表	(296)
附录三 军机四章京入值情况一览表	(308)

附录四 上谕档中关于司员士民上书处理情况一览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至八月初五日)	(310)
附录五 “百日维新”期间报刊论说要目	(317)
附录六 党祸详述	(322)
征引参考书目	(340)
谱主生平事迹索引	(351)
后记	(353)

前言

缘起

一百多年前的“百日维新”，以追求中国的制度变革、经济变革、思想变革为目的，在短短一百多天的时间里，颁布了多道上谕，设立了新机构，任命了一批新官员，正当改革往纵深发展时，出现了变故，变革历程被阻断。钦犯康有为、梁启超在逃，光绪帝新近任命的军机四章京^①、御史杨深秀、康有为的胞弟康广仁等人被捕，并迅速被杀。六人被杀时间是戊戌年农历八月十三日，距离中国传统的团圆日子“八月十五”，仅差两天，史称“戊戌六君子”。六君子被杀一事，令不少志士扼腕叹息。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已经有无数研究先进作了探讨。

正如朱维铮先生所指出的那样：百年前那场“变法维新”，尽管只持续了一百零三天，便以失败告终，但它却是中国的现代化的首次实验。由于这首次实验，是清帝国君主接受部分士大夫自下而上的吁求，而自上而下用“上谕”的形式推动的，因此可借龚自珍的话，称之为“自改革”。1898年的“百日维新”，正是以往百年梦境的终结。但倘说慈禧集团发动的戊戌八月政变，惊破了“自改革”的政治梦，那它也同时催醒了人们对传统儒学，尤其是与帝国意识形态紧密联系的传统经学的全面反省。从这个意义上说，

^① 军机四章京被任命及工作情况，茅海建先生在《戊戌变法史事考》里有详细严密的考证，基本观点如下：“1. 他们负责处理司员士民的上书，加上签语，供光绪帝参考；2. 他们四人分作两班，不在原有军机章京中排班，由于新旧矛盾，他们在处理条陈时经验不足，且无人帮助，致使出现不少错误；3. 他们处理的文件在帝国的政治中不算最为重要，但他们的权力实际上要大于军机大臣，这是因为军机大臣是奉旨拟旨，是先有旨意后有谕旨，而新进四章京是先有意见，然后奏明，形成旨意；4. 他们的任命未经慈禧太后的同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65—82页）尽管他们“要事概未与闻”，但如果考虑帝、后之间长期的矛盾，尤其是他们的任命发生在罢黜礼部六堂官之后，他们的被杀似乎具有某种必然性。关于帝、后之间的明争暗斗，目前讨论得最为详细和深入的，当推台湾学者林文仁所撰《派系分合与晚清政治——以“帝后党争”为中心的探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百日维新”又是儒学史的一个新起点^①。

所谓“自改革”，是崇拜王安石变法的龚自珍，隐括王安石变法宗旨，在鸦片战争前四分之一世纪提出的概念，意即帝国只有实行由上而下的自我改革，才能继续生存。这股“自改革”思潮，发展到19世纪最后二十年，已呈行将决堤的态势，尤其是在沿海诸省迅速泛滥，这造成众多论者的一种错觉，以为只要将真理灌输给权力者，尤其是灌输给乾纲独断的皇帝，催其醒悟，促其振奋，积弊便可扫荡，乾坤便可扭转。康有为、梁启超和他们的许多同道，就是这样乐观的。当光绪帝“诏定国是”以后，他们的兴奋真是溢于言表，岂知维新不过昙花一现，刚绽放，就夭折了。戊戌八月政变，最终证明要求这个帝国“自改革”，只是一种梦想。这场百年旧梦，也可说是一场“君子梦”^②。

在这场“君子梦”中，光绪帝在“百日维新”后期任用的四位四品军机章京，值得注意，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四人，被令“参与新政”，尽管他们参政时间短，从被任命到被捕，仅仅十八天，正如时人感慨林旭的命运时所说的“廿载头颅十日官”。但他们的命运，却与这场“君子梦”的破灭紧紧结合在一起，与“百日维新”后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密切相关，他们还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他们在军机处的活动，充满了无数疑团，而一些问题的清理，对我们了解“维新运动”相当关键^③。如他们被任命为军机四卿，参与新政，并未征得慈禧太后的同意，是什么原因促使光绪帝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他们的职责，是负责对司员士民上书“签拟”建议，供光绪帝参考，除此之外，有无别的使命？如草拟谕旨，或是光绪帝与康有为之间的消息传递者？康有为、梁启超所说的军机四章京的任用理由、权限和任职期间的活动，到底有多少值得信任？谭嗣同八月初三夜访袁世凯，告以“戊戌密谋”，是一个人独自去的吗？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去冒险？谭嗣同为什么拒绝出逃？如果他已经抱定了“为变法流血”的必死信念，为什么要在被捕后“入狱狂呼”，慨叹“官高者获免，独归罪于末秩？”在狱中书信中，让仆人“速电湖北”，

① 朱维铮：《从儒学史说到新儒学》，《走出中世纪二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01—302页。

② 朱维铮、龙应台编著《维新旧梦录——戊戌前百年中国的“自改革”运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2—23页。关于晚清“自改革思潮”的研究，朱维铮先生有详细精辟的分析，可参见朱先生著《维新旧梦已成烟——戊戌“百日维新”的前一百年》（《中华文史论丛》，第58辑），该文亦收入《维新旧梦录——戊戌前百年中国的“自改革”运动》。

③ 朱维铮先生在1998年曾经讲过：“时间过了一百年，但对维新一百天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仍旧不那么清楚。”（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自序，第2页）

是求救吗?

种种矛盾记述错陈,不同角色的人物对相关事件的记载众说纷纭。这些记载和陈述,为我们了解军机四章京性格的多样性、行为方式的复杂和矛盾,提供了基础。通过对军机四章京活动的考辨,也可以使维新运动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得以展现。将“军机四章京”作为一个群体,综合考察他们与维新运动的关系,将他们的活动放在晚清“自改革”思潮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将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因此本书拟采用大量的材料,简要勾勒出军机四章京一生的活动,考察他们成为四品军机章京的背景,以及就任四品军机章京期间的实际政治活动,来展示“百日维新”究竟会聚了怎样的改革向往与追求,考察“百日维新”究竟是哪些人在操作的,是哪些人在起作用,并借此来探讨“维新旧梦”破灭的原因。

一、军机四章京的简要经历

四位四品军机章京,来自不同的地域,成长经历有很大差别。从出生地来看,杨锐来自四川绵竹,刘光第是四川富顺人,祖籍福建,林旭是福建人,谭嗣同则来自湖南浏阳。从性格来看,“谭、林年少气盛,论议锋出折一世,为最易取忌怒,即杨君差持重,或遇感时发愤,犹稍自激昂。独君(指刘光第)澹泊遗物,不轻与人接,人亦莫由窥其蕴”^①,从社会关系来看,杨锐是张之洞的弟子,长期在张幕府里工作,又曾在京供职,善交际,与倾向维新的官员士人均有交往,参与了不少维新活动。刘光第长期在刑部任职,寡交往,“京华声利海,十年潜默坐”,活动圈子主要限于四川的京官和座师举主。林旭岳父沈瑜庆曾任职金陵筹防局,他随任期间,与张之洞幕府人员多有来往。谭嗣同之父谭继洵为地方大员,他曾在北京、甘肃、湖南、湖北和南京、上海之间往返,结交各方人士,受到多方面的影响。从人生经历来看,谭嗣同早年丧母,兄姊早逝,家庭关系不和谐,在科举考试上屡考屡败。林旭幼时双亲去世,清寒孤苦。杨锐受张之洞赏识,但在张幕府多年,默默无闻。刘光第家寒勤学,任职京曹期间,生活困窘。

但他们四人也有不少共性,他们都为候补官,对现状不满,都渴求朝

^① 陈三立著,钱文忠标点:《散原精舍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5—116页,时人对军机四章京性格的评析,可参见本谱的“谱后”部分。

廷变革。从一些友朋书信中，可以感受到他们关心国政，希望朝廷改弦更张、进行变革的心声。

刘光第希望朝廷变革的言论，至今读来，依然掷地有声。

（甲午战后）大势已不可为……徒令末秩小臣含血喷天，决眦切齿，坐视神州之陆沉而已。^①

譬如大器将倾，意欲起而扶之，而势有不能；漠然坐观其旁，而情有不忍，只有决然舍去之一法而已。^②

出山一行，并未报君父于万一，心实不甘。^③

为人臣子，思去其位，总觉有不忍决然之意，并非贪恋禄位也。以为稍缓须臾，或有忽然振作之一日，乘此机会，尚可有为，而平生自许之志，亦借以稍酬一二，以故含忧茹愤，徘徊国门者，正坐此耳。^④

迺者东朝震奋，似欲揽持纲柄，颇非旧制。然苟枢府二三大臣，皆得贤者为之，天下事亦未始不可理也。^⑤

方且徘徊市朝，冀气机之斡转。有如大廷一日尽易贤人君子，穆穆布列，维新守旧，咸得其宜。^⑥

谭嗣同从甲午战后，思想有一个大的变化，无论是“浏阳兴算”，还是“北游访学”，都是在探求变革的途径和方法，他设想的改革方针就是要广兴学校、大开议院、练海军、兴商务，等到国力强盛后逐渐废除不平等条约。他对传统文化的思考，他的保教、保种、兴民权的思想，他对维新事业的参与和维护，他的思想在晚清思想的地位，都引起不少研究兴味。谨择取其一二，来管中窥豹。

中国遂乃不可为乎？然则吾又将奚适也！^⑦

京朝官益以攻击为事，初尚分君子小人之党，旋并君子小人而两攻之。党之中又有党，党之中又自相攻，一人而前后歧出，一时而毁誉矛

① 刘光第：《自京师与自流井刘安怀堂手札》第四十三函，《刘光第集》，第255页。

② 同上书，第256页。

③ 刘光第：《自京师与自流井刘安怀堂手札》第四十六函，《刘光第集》，第261页。

④ 刘光第：《自京师与自流井刘安怀堂手札》第五十二函，《刘光第集》，第274页。

⑤ 刘光第：《上张安圃师书》，《刘光第集》，第291页。

⑥ 同上。

⑦ 谭嗣同：《吴铁樵传》，《谭嗣同全集》，第257页。

盾。如釜中虾蟹，嚣然以哄，火益烈，水益热，而哄益甚，故知大劫不远矣。^①

时事奇艰，所怀万绪，爬进之效，云胡可期？^②

今之时势，不变法则必步宋之后尘。^③

也许正是由于四人共同具有变革的意向，希望清廷能够“自改革”，所以才被保荐，受到光绪帝的召见，并被任命为四品军机章京，参与新政，见证了维新旧梦的破灭。

除了有变革的意图外，四人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仕途不顺，郁郁不得志。中国传统士人历来都有“经世致用”的传统。“得君行道”，实现政治抱负，在谭嗣同等人心目中相当重要，可是在当时的现实中，他们职卑位微，面临不少困境。在生活困难的经济重压下，刘光第一方面用清寒自持来磨砺品格；另一方面，仍将希望寄托在仕途的登进上。谭嗣同在科举考试中屡战不利，不得已通过捐纳谋求一官半职，他渴望借此能够实现自己的抱负，但却不如意，他慨叹“做吏一年，无异入山”。任军机章京前杨锐为内阁候补侍读，林旭为内阁候补中书，刘光第为刑部候补主事，谭嗣同为江苏省候补知府，当他们被超擢为四品军机章京时，非常感激“天恩高厚”，“虽不值钱之候补官，亦珍贵如此”，抱着“朝廷毅然变法，国事大有可为”的念想。

然而置身局中，他们才发现政治斗争的尖锐。“新旧两党，互争朝局”，他们被裹挟进政治斗争的旋涡，成为晚清“自改革”思潮的殉难者。

以下对他们成为军机四章京前的经历作一简单勾勒。

杨锐，四川绵竹人，张之洞弟子，曾在四川尊经书院读书，受教于王闿运，与廖平同学。壬午科四川优贡，乙酉顺天乡试举人，光绪十五年（1889年）考取内阁中书。曾入张之洞幕府，负责文牍，并在经心书院、两湖书院任教。他谨慎绵密，深得张之洞的信任，系张在京之“坐探”，经常通过书信为张提供来自北京的消息。^④三十岁前后，思想有变迁，由

① 谭嗣同：《仁学》四十二，《谭嗣同全集》，第356页。

② 谭嗣同：《致徐乃昌》二，《谭嗣同全集》，第521页。

③ 谭嗣同：《致唐才常》二，《谭嗣同全集》，第529页。

④ 杨锐任职北京期间，常在北京、湖北间往返。但他不知何因，一度不愿回张之洞任所，梁鼎芬在给汪康年的信中说：“叔峤今年不欲返，南皮屡电促归，乃出京，且预言九月北上。今到期，再申前约，南皮难之，兄力主其行。”（《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二册，第1891页。）

重视经史辞章转为关心时政。甲午战争后清廷屈辱求和的举动，令他十分反感，他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说：“张、邵到广岛，倭酋以国书不合不与开议，已遭巡捕送至长崎，不日即乘轮回华矣。辱国至此，敷天忠愤之气，或可因之激发。……若不有精兵猛将大举北援，大局恐难望转机，外间办事仍不免多所掣肘，奈何奈何！”^①他参加了康有为组织的公车上书活动，同时也与其他官员联名上书，主张拒签和约。他是强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参与了筹办强学会，强学会遭禁后，他力倡恢复。1897年胶州事变爆发后，高燮曾推荐康有人万国弭兵会，杨锐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②杨锐善交往，生活圈子较广，与文廷式、朱一新、梁鼎芬、汪康年、国子祭酒盛昱、尚书潘祖荫、清流名角黄体芳等人均有来往。在《呈潘尚书》中，他说“独惭误读南华后，虚负昌黎荐士诗”，称自己因读了南华经，辜负了潘的推荐好意。在京期间，他还负责《时务报》在京的分送，并创办了蜀学会、蜀学堂，参加了保国会。

与杨锐相比，刘光第不善交往^③，他的交往圈，主要集中在同乡之间。他在1896年路过武昌时，拜谒了张之洞，并在上海见到梁启超，次年他撰写了《湖广总督张公六十寿序》，建议张之洞入枢府，得到张的赞赏。他在京期间的生活来源，一靠俸禄，一靠同族刘庆堂的资助，另外还有印结及冰敬、炭敬，但依然入不敷出。初任京官时，他到署甚勤，每月必到二十八九天。因在断案时，发现弊端，而他认为“刑狱关人命，懼直道难行，致枉屈”，遂绝迹不至署。^④

刘光第对国事充满关切，时时希望清廷能够振作起来，在他的书信里，多次提到天灾，认为是天象示警，令统治者迅速改弦更张。统治集团出现些微的变革气象，他都会欣喜万分。他在1894年的一封信里说：“最可幸者，今年朝政大有起色，举直错枉，颇洽人心，今上大有乾纲独揽之势，固祖宗社稷之灵，亦天之眷我国家未艾也。兄即窘迫度日，而乐颇有余矣。”^⑤

甲午战争期间清廷事权不一，和战依违，导致战场上的节节败退，刘光

① 杨锐：《致汪康年》，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三册，第2402—2404页。

② 高燮曾推荐康有人万国弭兵会，可能与康有为的政治贿赂策略有关，参见马忠文《高燮曾疏荐康有为原因探析——兼论戊戌维新前后康、梁的政治贿赂策略与活动》，《学术交流》1998年第1期。

③ 赵熙在日记中称刘光第为“不为外务屈伸者”，参见赵念君《由香宋诗文中见到的刘光第、杨锐》，《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页。

④ 高楷：《刘杨合传》，《碑传集补》卷一二。

⑤ 刘光第：《自京师与自流井刘安怀堂手札》第四十一函，《刘光第集》，第251—252页。

第在1894年准备上书，请慈禧太后归政，光绪帝乾纲独断，因言辞激烈，刑部堂官拒绝代递。甲午战争后，刘光第曾在杨锐处看到条约，他是否参加了拒签和约的活动，现已难以搞清，但他的一句话，却反映了他对时局忧愤愁闷的心态，他说：“兄每对人言，数年以来，穷也穷不死人，惟去年以来，所见所闻之事，真是要气坏人，愁坏人也。”^①

刘光第一直在仕与隐之间徘徊，他之所以未隐退，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希望政府能够一朝振作，自己可借此有所作为，他说：“为人臣子，思去其位，总觉有不忍决然之意，并非恋贪禄位也。以为稍缓须臾，或有忽然振作之一日，乘此机会，尚可有为，而平生自许之志，亦借以稍酬一二。”^②

林旭早年丧亲，勤学苦读，19岁应童子试，成附生，当年又中举。“领乡荐第一，闾作传诵天下”。他随岳父沈瑜庆（沈葆楨之子）到金陵筹防局，与张之洞的幕僚诗酒唱和，多有往还。在甲午战争后拒签和约的运动里，他曾经与陈衍等人联名上书，主张以“迁都”来解决问题。林旭曾经在上海学习英语，王锡蕃在推荐他的奏折里，对他关于外国政治思想的认识，加以特别提及，“于西国政治之学，讨论最精，尤熟于交涉商务”。林旭热心于政治活动，曾创办闽学会，并参与了保国会的活动，在《京城保国会题名记》里，名列第四。他曾入荣禄幕府，任军机章京期间，荣禄写信提醒他：“执事此次渥奉恩纶，拔登枢府，朝廷孜孜求治，破格用人，诚为非常遭际，匡时谋国，自可大展长才。遇有新政事宜，枢廷诸老，计必虚怀下问，务祈斟酌情形，悉心商办，自必日见起色也。目前补偏救弊，似不在遇事纷更。”^③

谭嗣同的一生，则是多灾多难的一生。他幼年丧母，受父妾虐待，深感纲常伦理的束缚，产生“冲决网罗”的想法。在科举考试上，他从未成功过。六赴南北乡试，次次落榜。当别人要和他讨论八股文时，他感到受宠若惊，但在内心，他对科举考试，已经毫无信心，他说：“闾中之光怪陆离，殆有十倍于去年者，即欲诡遇，已不胜轮毂添溢，遂决计不读一文，不立一义，我行我法，成功则天，转觉超然。”^④ 他南北壮游，了解风土人情，增

① 刘光第：《自京师与自流井刘安怀堂手札》第四十七函，《刘光第集》，第265页。

② 刘光第：《自京师与自流井刘安怀堂手札》第五十二函，《刘光第集》，第273—274页。

③ 清华大学藏：《荣禄函稿底本》，转引自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994页。

④ 谭嗣同：《致刘淞芙》五，《谭嗣同全集》，第482页。

进学识，颇有侠气。

他通过捐纳所获取的候补官身份，并未对他的境况有多大改善。在强学会成立前后，他并不引人注目，“己既不求入会，亦无人来邀”。1896年的北京之行，使他增长了见识，并结交了吴樵、梁启超、夏曾佑等朋友，扩大了交往圈。在南京任候补官期间，他时常来往于沪、宁间，参与了许多维新活动。^①他于1898年携眷返湘，参加了湖南的维新运动。在维新运动中，勇于担当，上书湖南巡抚陈宝箴，请求筹划“亡后之图”。他盛赞康有为“传孔门不传之正学，阐五洲大同之公理，三代以还一人，孔子之外无偶”^②。在《湘报》中对康有为勇于上书的举动表示钦佩，称康有为“愤不顾身，伏蒲而谏，敬王莫如我敬，言人所不敢言，其心为支那四万万人民请命，其疏为国朝二百六十年所无也”^③。在时务学堂课卷修改一事上，勇于为熊希龄等人辩护，此举引起支持维新事业的陈三立、邹代钧等人的不满，并导致他和唐才常与老师欧阳中鹄之间的关系紧张，但他自称“宗旨所在，亦无不可揭以示人者，何至皇遽至此？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其初心乎”^④，几乎成仇。新派间关系紧张如此，而反对者又攻击不断，维新运动面临巨大挑战，四月二十五日，徐致靖推荐他“天才卓犖，学识绝伦，忠于爱国，勇于任事，不避艰险，不畏谤疑，内可以为论思之官，外可以备折冲之选”，同日有旨令督抚送谭入京引见。处于困境的谭嗣同，认为自己绝处逢生——虽然湖南维新运动遇到很大阻力，但他可以到北京去发展。在给夫人李闰的信中，他说“我此行真出人意外，绝处逢生，皆平日虔修之力，故得我佛慈悲也”^⑤，虽然因为病情耽误了行程，但朝廷的屡次电催，终使他赴京，为维新变法献出生命。

一旦成为军机章京，参与到实际政治活动中后，他们才发现，面临的是一个波谲云诡的变局。帝后间的矛盾，已裁及将裁衙门官员的担忧，政治谣

① 谭嗣同参与了不缠足会、农学会、蒙学会、中国女学会的活动，梁启超称他和谭嗣同还创立了一夫一妻世界会，“一夫一妻世界会，我与浏阳实创之，尊重公权割私爱，须将身后作人师”（《清议报全编》，卷十六，第87页）。此会是在筹议中，还是已付诸实践，待考。

② 谭嗣同：《上欧阳中鹄》二十二，《谭嗣同全集》，第475页。

③ 谭嗣同：《读南海康工部有为条陈胶事折书后》，《谭嗣同全集》，第421页。

④ 谭嗣同：《上欧阳中鹄》二十一，《谭嗣同全集》，第474页。

⑤ 谭嗣同：《致李闰》一，《谭嗣同全集》，第530页。

言的风起云涌^①，满洲官员对“保中国不保大清”的怨恨和惧怕，对罢黜老成和登用新进的腹诽，均交织在一起，使他们举步维艰。而他们内部，又存在着政见的歧异^②，而举动言语不慎，缺乏实际政治经验，则是他们的致命伤。^③ 尽管光绪帝为了获得变革的主动权，可能在“百日维新”前，对慈禧太后做出了一些策略性的让步，如在人事方面对帝师翁同龢的罢黜和对荣禄、王文韶的调动，但随着维新步伐的加大，变法内容是否正确，可能已经不是重点，而由谁来掌握变法的主导权，反会成为问题的焦点。密诏传出，各方政治力量纷纷活动，虽然四章京接到密诏后的活动依然扑朔迷离，但在那样的政治情境下，帝后矛盾，新旧党争，对外人对康有为、梁启超的营救，袁世凯的告密，朝廷的权力与外人的干涉等，纠葛在一起。一位御史在奏折中称如外人干预，“从之则无以彰国法，不从又无以顾邦交”，将四章京推向了死路，未经任何审讯，他们就为晚清的“自改革”殉难，给后人留下感慨惋惜的同时，也留下了不少无解的谜团。

① 苏继祖在《清廷戊戌朝变记》里称当时的谣言甚多，“正月以来，都中上自王公，下及士庶，众口哗然，谣言四起，多由显者口中传出，故信之者众……朝野议论，无处不谈康有为，内言传于外，外言又传于内，愈出愈奇，不值识者一笑”（《戊戌变法》，第1册，第335页）。而新进少年的慷慨放言，也给媒孽其短的谣言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当时之物议沸腾，且因新党中少年高兴到处议论某官可裁，某人宜去，现已如何奏请皇帝飭办，而皇上发下何旨，肆意矜张，为守旧中有心相仇者听去遍传也”（中国史学会：《戊戌变法》，第1册，第337页）。

② 杨锐、刘光第任职期间的书信，反映了他们的政治态度，杨锐对康有为的政治态度有所保留，为康有为事，曾与谭、林发生冲突，刘光第则自称无新旧之见。杨锐称：“现在新进喜事之徒，日言议政院，上意颇动。”康有为称谭嗣同、林旭请开议院，而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附录三“光绪圣德记”里，也记载光绪帝欲开议院，受到光绪帝召见的严复、钱恂也透露出光绪帝有此想法，综合以上论述，谭嗣同、林旭可能有开议院的想法，而且光绪帝可能亦赞成，但他们设想的议院，或者杨锐说的“议政院”，在提倡者或反对者眼中，是否属于同一概念，其内涵与外延有无差异，与西方的议院及今人理解的议院有无距离，或者说，与懋勤殿有无关系，尚存在疑团。不过，可以看出，军机四章京在对待康有为的问题上、在新的政治机构的设立上，存在不同意见。

③ 费行简在《慈禧传信录》里称四章京非任事才，亦乏谋略，“其党中传嗣同犹天人，而予与稔交，知其博辨喜事，滥交寡识，初非任事才，杨锐林旭皆温雅辞章之士，更鲜老谋”（中国史学会：《戊戌变法》，第1册，第467页）。时人也多批评其处事不缜密。如郑孝胥告林旭“慎口”，皮锡瑞在日记中感慨：“使新学诸人如此谨慎，党祸不起矣。”上注苏继祖也提到他们的不谨慎，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里提到谭嗣同受命草拟开懋勤殿的谕旨，称“至二十八日京朝人人咸知懋勤殿之事”，事情尚在可否之间，已经喧传都下，从侧面反映了他们的不谨慎。在湖南期间，谭嗣同在《湘报》中的一些言论，令谨厚持重的皮锡瑞感到不安，湖南巡抚陈宝箴曾示意唐才常注意言语，唐在给陈的信中表示要慎言，“受业与七丈（指谭嗣同）熟商之，始形诸笔端，亦以见中国之失策也。以后遇此等处，自当恪遵师训，千万放心”（《唐才常集》，第241页）。

二、研究史的回顾

(一) 有关军机四章京的研究论著介绍

马忠文先生曾如此评价对戊戌政变的研究,他说:“一百多年来,学界的研究已有较大推进,特别是清宫档案的大量使用,使得人们对政变发生的原委有了更准确的了解。当然,由于与政变相关的直接证据相当有限,而已披露的材料记载往往彼此矛盾,加之学者的解读视角又各自有别,使得我们今天对政变内幕及有关细节的认识仍然存在相当的分歧。”^①可以说,这种状况,在对军机四章京的研究中同样存在。

对军机四章京生平的研究,以对谭嗣同的研究最多,据香港中文大学陈善伟统计,1899—1978年,关于谭嗣同的著作和各类文章以及谭嗣同的文集、墨迹等,共达205种^②。在美国,据邝兆江统计,截至1977年,以谭嗣同为研究中心的博士论文至少有四篇^③。

谭嗣同年谱至少有三种^④,谭训聪、陈乃乾、杨廷福都撰写过谭嗣同的年谱,陈乃乾所撰最为简略。杨廷福所撰年谱篇幅较大。^⑤通观三种年谱,均收集了大量材料,勾勒出谭嗣同生平活动的各个方面。但它们对以下几个问题,均未深入展开:(1)对谭嗣同在维新运动时期的活动,尤其是在光绪二十四年到北京后的经历,描述的比较模糊。(2)对谭嗣同在湖南维新运动中的地位界定不明确,在具体事件上,如谭嗣同在浏阳兴算、赈灾、开矿,以及与时务学堂、南学会的关系,或考证不详,或略去不提。

谭嗣同的传记,有邓潭洲著《谭嗣同传论》,李喜所著《谭嗣同评传》,二书对谭嗣同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变迁,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由于两书成书于20世纪80年代初,一些观点和看法尚待商榷。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了蒋广学、何卫东所著《谭嗣同评传》,系“中国思想

① 马忠文:《戊戌政变研究三题》,《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0期。

② Chan Sin-wai, Tan Ssu-t'ung: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0. 陈书对有关研究论著的内容及学术价值进行了介绍。

③ Luke S. K. Kwong, Tan Ssu-Tung, 1865-1898, *Life and Thought of a Reformer*, E. J. Brill Leiden, New York, 1996, p. 3.

④ 台湾曾出版《谭嗣同年谱新编初稿》(中华仁学会丛书第二集),惜未见到。

⑤ 陈光崇的《〈谭嗣同年谱〉补正》,对杨廷福撰《谭嗣同年谱》加以订正(《辽宁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2期)。

家评传丛书”之一种，与以往对谭嗣同思想是唯心或唯物、信仰佛教是否悲观厌世、改良还是革命的争论^①不同的是，该书提出了谭嗣同融合耶、佛、孔三教，来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并重申谭嗣同是“典型”的改良主义者。

田伏隆、朱汉民主编《谭嗣同与戊戌维新》论文集，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料和研究视角，对谭嗣同父亲谭继洵、谭嗣同与金陵刻经处和谭嗣同的思想及其在湖湘文化中的定位，都作了深入研究。在师友交往方面，贾维的《谭嗣同与晚清士人交往研究》和丁平一的《谭嗣同与维新派师友》，通过大量的材料和考订，将对谭嗣同的研究提升了一大步。^②

罗福惠揭示的谭嗣同思想研究^③中存在的问题，值得在所有谭嗣同的研究中加以注意。他说：谭嗣同思想存在着矛盾和偏失，要准确把握其思想，就必须关注语境和采用“内证”的方法，他认为在对谭嗣同思想研究中存在如下问题：有关研究成果多从“单面”入手，或从“直线”出发，对其思想的进步卓越之处加以解释和发挥，而对其言论的复杂、矛盾乃至偏失却一笔带过甚至避而不谈，致使不少青年读了谭嗣同的原著大惑不解。从根本上说，谭嗣同思想的“幽挚”、“精锐”，正与其复杂矛盾息息相关，失去彼一面，就难有此一面，这就是他常说的“相反相成”，因而他的偏颇，除了深思熟虑不够之外，还有有意为之的因素。^④

① 谭嗣同的思想究竟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一直是史学界和思想界争论的重要问题。有三种观点，一种认为谭嗣同的思想属于唯物主义阵营，一种认为谭嗣同思想属于唯心主义阵营，一种认为谭嗣同思想既有唯物的成分，又有唯心的成分，既有辩证的观点，又有形而上学的因素，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对其思想是改良或革命，亦有争论，一种观点认为谭嗣同虽然对封建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批评，但同时其思想中又具有颇浓厚的封建性，虽有一定的反清思想，但又有强烈的忠君观念，其思想并未逸出改良主义的轨道。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谭嗣同的思想中包含了民主主义的观点和反清革命思想，实际上确已超越了改良主义的范围。

② 研究谭嗣同师友交往的论文主要有：邝兆江：《马尚德——谭嗣同熟识的英国传教医师》，《历史研究》1992年第2期；邝兆江：《谭嗣同与傅兰雅的一次会见》，《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6期；张求会：《陈三立与谭嗣同》，《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贾维：《谭嗣同与盛宣怀》，《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1期。

③ 对谭嗣同思想进行研究的主要论著有：张德钧：《谭嗣同思想述评》，《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小野川秀美著，林明德、黄福庆合译：《谭嗣同的变革论——其形成过程》，《晚清政治思想研究》，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版。徐义君：《谭嗣同思想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黄卫平：《思维的悲剧和悲剧的思维》，云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李喜所：《谭嗣同与自然科学》，《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5期；王樾：《谭嗣同变法思想研究——从仁学的思想则论谭嗣同的变法理论与实践》，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印行；王德昭：《谭嗣同与晚清政治运动》，《从改革到革命》，中华书局1987年版。

④ 罗福惠：《解读谭嗣同》，《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1期。

林旭的存世资料不多，研究论著主要集中在对他的生平事迹的考订上，如《林旭史迹汇考》、《林旭行实系年》、《戊戌年间林旭事迹钩沉》等。对杨锐的研究，尽管存世材料不多，但学者还是进行了不少探索。^① 对刘光第的研究，除了大量对他的维新思想进行研究的论文外，^② 还有《刘光第年谱》、《戊戌变法一志士——刘光第传》等论著。2006年，刘光第后人曾将刘的手稿捐给四川富顺县档案馆，刘华杰经过对比，指出手稿中一些内容未收入《刘光第集》，如《由夏口至荆沙里河杂咏》手稿中为二十首，集中只收录了十八首。还有部分诗手稿本与《刘光第集》中内容迥异，如《丞相祠堂》、《禹庙》。在《试帖诗赋》，共有三十三篇赋，集中只收录了《鹤守梅赋》。试帖诗三十三首，集中只收录了《大乙乘莲》、《韩蕲王湖上骑驴》、《与尔同销万古愁》、《老骥骨奇心尚壮》四首。未收入的如试帖诗《晓霜枫叶丹》。^③

王文等人所编《杨锐刘光第研究》一书，1989年由巴蜀书社出版，共收入论文24篇。是首届杨锐、刘光第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王文、曾绍敏在《首届杨锐、刘光第学术讨论会概述》中总结出四个特点：（1）代表们

① 考订及介绍史料的论著主要有：胡立三：《海内孤贞——杨锐出赠刘光第的诗幅》，《四川文物》1985年第4期；宁志奇：《杨锐家书暨杨聪墓志铭》，《四川文物》1985年第4期；胡昌健：《介绍杨锐两件遗物》，《四川文物》1989年第4期；高成英：《杨锐的诗草手迹》，《四川文物》1989年第4期；张荣祥：《杨叔峤先生会课遗墨介绍》，《四川文物》1989年第4期；李宗侗：《杨叔峤光绪戊戌致张文襄函跋》，《大陆杂志》，第19卷，第5期。关于杨锐思想变迁及政治作为的论著主要有：胡立三：《关于杨锐的几个问题——狐桶、马褂料之诬》，《文史杂志》1986年第2期；胡显惠：《评清末维新运动中的杨锐》，《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徐昌义：《杨锐在戊戌维新运动中的政治倾向初探》，《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孔祥吉：《关于杨锐的历史评价》，《史学月刊》1989年第4期；林顿：《杨锐、刘光第、宋育仁爱国主义思想浅探——兼论维新派与光绪帝之双向依赖》，《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岳保智：《戊戌变法中的杨锐》，《历史教学》1990年第11期；蒋懿菊：《应恢复杨锐维新志士的历史地位》，《历史档案》1995年第4期；宋兴华：《杨锐真假维新辨》，《重庆师院学报》1996年第1期。

② 对刘光第思想进行研究的论著主要有：张修云：《刘光第的爱国思想及其与维新派之区别》，《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吴杰：《论刘光第》，《史林》1988年第1期；丘铸昌：《刘光第“右翼说”质疑》，《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何一民：《从传统士大夫到近代改革者——刘光第思想研究》，《史学月刊》1989年第3期；曾鸿：《刘光第与中日甲午战争》，《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1期；苏全友：《试论刘光第“坐以待捕”的主观动因》，《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4期；曾宪辉：《刘光第生平思想简论》，《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2期；陈鹏：《刘光第新评》，《学术月刊》2004年第6期；邹礼洪：《试论刘光第“取其长而制其害”的西学思想》，《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考订类的论文有：曾宪辉：《刘光第年谱》，《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苏钟生：《刘光第与客家祖地闽西》，《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③ 刘华杰：《刘光第先生手稿及捐赠始末》，《四川档案》2007年第4期。